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3.019

新世纪文学视域下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

李胜清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方言与文化科技融合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是新世纪文学一种新的表意动向。这种书写实际上是一种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它重构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这种诗性书写是通过回归与激活传统美学而实现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美学风格是它的基本资源依凭。美好人性人情、具审美现代性质素的文化乡愁与故乡记忆、具形而上性质的精神境界与意义世界、神秘地域文化与民族神话叙事等形构了中国形象诗性书写的审美意涵;在艺术形式与话语风格方面,这种书写氤氲着一种古典美学趣味,表现出鲜明独特的“中华审美风范”。从深层文化意味来看,这种书写是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灵魂书写与精神烛照。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中国形象;诗性书写;重述中国;传统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3-0147-06

在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多元化想象和书写中,重构中国形象的诗性之维渐次成为一种新的表意动向。这种情况表明,新世纪文学对于中国形象的书写不但超越了西方“他者化”价值范式的宰制性影响,而且确立了自我书写的主体性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问题意识,自觉从诗性之维来书写中国形象就是这种问题意识的重要表征之一。

一 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

就新世纪文学而言,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它不但关乎中国形象诗性品格的历史赅续,而且关系到这种品格的当代重构。作为一种本质意义上的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与实践,它既是对新世纪语境中新出现的中国表情、中国经验的审美呈现,也是关于中国故事的另一种讲述方式,建构了当代中国形象书写新的意义生长点。

作为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之所以成为一种新的审美现象,其前提就在于新世纪语境中的中国形象本身及其内涵出现了新质,具有诗意性质的日常生活、社会人生日益成为中国形象书写的主要价值关切。历史地看,诗

性品格一直构成中国形象及其社会生活内涵的本体论属性之一,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基于商品化、消费化以及全球化的宰制性影响,从世俗化、消费化等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角度来塑造中国形象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学倾向。不可否认,就结构性的中国形象及其内涵而言,某种程度的世俗化与消费化无疑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在这种被严格规定的意义上,书写世俗性的中国形象及其内涵也是文学的诉求之一,但是一旦逾越其边界失于泛滥,它就可能导致中国形象及其内涵陷入某种极性世俗化与消费化的单维度状态。这种情况意味着,世俗化、消费化的中国形象成为文学书写的主要旨趣与关切,而其诗性品格则日渐式微,沉潜为某种被遮蔽与被遗忘的状态。就此而言,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实际上是对另一种中国经验的重现与另一种中国表情的重塑,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解蔽与澄明,它召回了人们关于诗性中国的形象记忆与文化身份认同。在这样的问题域中,反思并解构从工具理性维度解读和书写中国形象成为文学重述中国的自觉选择,新世纪文学开始注重从价值理性、审美现代性维度来解读和书写中国;更着意于从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中国文化心理等体验性层面书写

收稿日期:2021-01-24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联重点项目(XSP18ZDI009)

作者简介:李胜清(1971—),男,湖南耒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文化研究。

中国形象;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主体属性如理想性、传奇性、浪漫性、神圣性等方面成为重述中国的意义落点,关于超越品质、象征意蕴、审美浪漫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的审美言说丰富、刷新了新世纪的中国感知,形塑了新的中国印象,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似曾相识但又有些许陌生的中国经验。

全球化语境下,重述中国还蕴含着重新定义中国形象及其如何参与全球化的深层意涵,“对中国的当下来说,国家形象,可以成为中国重思自己和重思世界的一个契机”^①。重述中国实际上就旨在对中国形象的全球化内涵与属性进行一种文化省思与美学重构,以便建构一种相异于以往那种全球化属性有余而民族个性不足的中国形象。问题是这种提法意味着,要塑造具有全球化品格的中国形象,不但应该注重中国与其他国家相似或相近内涵属性的书写,更要注重对中国经验及其独特规定性的书写,并且以这种彰显中国历史和民族独特个性的“和而不同”的方式参与全球化进程,修正、重构新世纪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在世方式与介入全球化的方式^②。新世纪文学通过展示一些新的美学姿态,已部分地实现了重述中国的这种诉求,具体而言,就是从民间文化、边地文化和历史文化等本土资源中汲取审美诗情以建构民俗中国、风物中国、古典中国等几类独特诗性形象,丰富新世纪中国形象的打开方式,为中国形象的全球化呈现提供新的表征维度与致思向度。

重述中国是新世纪文学对中国形象所作的一种新的想象与书写,这种新的想象和书写在新世纪语境中接续了从诗意之维书写中国形象的审美范式,确立了当代中国形象书写的复调意义结构,充分估计了中国形象价值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尊重了中国形象的过去与现在及其祖述关系。

二 回归传统的美学视域

对于新世纪文学而言,从诗性维度重述中国显然不能缺乏特定的资源依凭和切入角度,否则这种重述行动就是任性的和虚妄的。鉴于全球化语境对于个别民族及其生活经验的趋同化形塑,试图借助这样的同质化经验来言说独特性的中国

形象或者中国形象的独特性无疑是不现实的。在某种意义上,新世纪文学之所以要重述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同质化经验以及趋同性国家形象书写的反思和解构,因此,规避同质化,通过回归具有独特规定性的本土文化传统以彰显中国形象的个性尤其是诗性品格就成了新世纪文学重述中国的必然选择。

如果说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书写的特点在于其诗性书写,那么选择回归传统来实现这个特点就构成其诗性书写的独特路径。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路径,其外因和内因兼有,回应全球化语境下独特中国形象的书写需要是其外因,而重构中国形象的诗性品格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接续其诗性谱系乃是内因。就前者而言,传统文化资源及其所彰显的美学视域丰富了新世纪文学及其关于中国形象的想象,能有效廓清中国形象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记忆,“融入了全球化的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它应该是能够充分地表现中华民族的生活体验、传统习惯、审美情趣的;它应该是和我们几千年来的悠远流传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学浑然相接、和谐融入的”^③。而从后者来看,新世纪文学放弃了对20世纪90年代先锋叙事、形式实验与语言游戏等创作技巧的迷恋,重拾文学与自然、社会以及内心情感的联系,建构了从抒情传统和人文主义美育传统书写中国形象的新的美学范式。“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重新反观内心,以小说的形式检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心路历程,检视内心的矛盾或惶惑,也是一种端倪初露的现象之一。这个现象也可以说是向传统回归的现象。”^④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哪种情形的回归传统,我们都不能仅限于纯粹技术层面的考察,回归传统最贴切最本己的含义显然指涉着某种形而上的品性与超越性的精神,一如李敬泽关于莫言长篇小说《生死疲劳》的意义阐释:“《生死疲劳》是一部向我们伟大的古典小说传统致敬的作品。这不仅指它的形式、它对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忠诚,也是指它想象世界的根本方式。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的命运就是世界的命运,人物带动着他的整个世界,比如《红楼梦》,整个世界跟着那个人颓败下去,《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也

①张法:《国家形象概论》,《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②刘中望,周凝绮:《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③白烨:《2005年中国文坛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

④孟繁华:《作为文学资源的伟大传统——新世纪小说创作的“向后看”现象》,《文艺争鸣》2006年第5期。

是如此。这一点过去很少有人注意,这恰恰是古典小说的根本精神,现代小说已经遗忘了这样的志向,而《生死疲劳》让我们记起了那种宏大庄严的景象。”^①其中的核心义理就是要切中中国人的独特主体性格、情感意志与心理体验,表达中国人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独特理解,关于自我存在意义的独特思考,以中国文学书写“中国之心”。对新世纪文学的中国形象诗性书写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某种方法论,而且直接关涉其本体论的内容构成。

作为一种具有“情本体”结构特点的文学形态,中国文学一直注重“体验式”书写,即从体验维度对对象进行书写,表达主体之于对象的情感态度与意志心理,这种情况在传统美学视域中表现尤其突出。从这种意义上说,新世纪文学在中国形象诗性书写问题上选择回归传统实际上就是回归古典美学视域的“情本体”结构与体验书写。在这样的问题框架中,除却继续展示、描述侧重客体层面的“中国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对那种侧重主体维度的独特“中国体验”的表达,“中国体验”与“中国经验”尽管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但在相对的意义,两者侧重点不同且具有不尽相同的美学功能。回归“中国体验”书写意味着新世纪文学对中国形象内涵中主体维度与人文因素的关注,对中国人独特丰富的存在性状、生命历程、人生态度、信仰立场等的关注,在这种性状下,人们关于特定对象的情感态度取代对象本身成为文学书写的重点。就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而言,要从精神实质上认识、理解中国形象并获得切身体验,人们更多地应该通过对中国形象内涵中的人和事所进行的意义解读、阐释来达成,而不是仅仅浅止于那些纯粹实证性的与经验性的人和事本身,因为它们建构的只是中国形象的表象与形式,而体验维度的书写则可以有效地勾勒中国形象的精神肖像及其意义形态,指涉人们的精神世界与心灵秩序。

通过回归传统来重述中国尤其是进行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对于新世纪文学的意义当然不限于形式技巧层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中所澄明的问题框架与提问方式。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典型的人文品质,始终关涉人性人情,以人为目的进行叙事。相较于那种纯粹的科学主义文学观而言,这样的美学姿态既接地气,又因为超升于现实之上且注重生活意义的质询而幻化出浓

重的诗性气质。新世纪文学在美学视域上选择回归传统,实际上就是选择回归中国古典诗学的诗性现场及其当代形态。

三 中国形象诗性意涵的文本表征

作为对中国形象意义域的一种丰富与拓展,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审美实践的方式探究新的历史语境下塑造怎样的中国形象以及如何塑造的问题,换言之,新世纪文学是以诗性中国来重新定位中国形象的。从诗性之维来书写中国形象既彰显了某种历史感,又展示了中国形象诗性内涵在新的语境中所具有的新的可能性与意义向度。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新世纪文学视域中的中国形象诗性意涵呈现出一种全息性的特点,在中国经验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其意义痕迹,以某种复调文本叙事的意义结构表征了它在新世纪文学场域中的独特在场与美学态度。

在新世纪文学文本中,中国形象诗性意涵的延展似乎没有边界的限制,它几乎指涉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诗性意涵之于中国形象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本体论的价值规定与身份规约。面对新世纪文学文本丰富复杂的意义世界,我们至少可以在四个方面发现诗性意涵的对象化显现。通过对美好人性人情的刻画以书写中国形象诗性意涵是新世纪文学表意的一种自觉选择。事实上,书写美好人性人情一直构成中国文学的美学传统与惯例,但是在新世纪语境中,这一点却具有某种新的特殊的意义,面对文化全球化及其趋同性甚至是工具性的强势话语扩张,新世纪文学选择以中国立场来书写美好人性人情尤其是深具中国传统特点的人性人情似乎是一种自我孤立、自说自话的不合时宜之举,但在事实上,这却昭示了新世纪文学在事关中国形象书写问题上的文化自信与自觉,书写具有传统诗性意味的人性人情彰显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显示了某种对抗全球化的审美之思。铁凝的《笨花》、贾平凹的《秦腔》和《古炉》、王安忆的《天香》、余华的《兄弟》与《第七天》、苏童的《河岸》与《碧奴》、刘醒龙的《天行者》等都从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描述了主人公们面对复杂社会关系与生活环境所展示的温情与人性。在具体的文本中,有对诗意内涵的直接书写,也有通过否定或批判非诗意生活的

^①莫言,李敬泽:《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方式来间接彰显某种诗意的意向,在诗意书写的总基调下,其维度是多元化的。为了反思、解构工具现代性所催生的商业化、消费化与都市化生活趣味,新世纪文学开始致力于书写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的社会人生与生活,以期重新为生活世界赋魅,重拾人生的神性与诗性,重构中国形象的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就更侧重对日益解体中的传统乡土的现代性乡愁的抒发,更关注农民的灵魂状态,文化人格,更关注他们在急遽变革的大时代中道德伦理的震荡和精神的分裂,从而把表现重心放到中国农民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而其表现手法,大都具有与政治经济事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淡化写实性,突出写意性,突出文化想象的特点”^①。文化乡愁与故乡记忆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被召唤,成为新世纪文学中国形象诗性意涵书写的特殊意义落点。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铁凝的《笨花》,阎连科的《受活》《耙耨天歌》《坚硬如水》,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鲁彦周的《梨花似雪》,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高建群的《大平原》,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神木》,关仁山的《天高地厚》,孙惠芬的《歇马山庄》,林白的《万物花开》,雪漠的《大漠祭》等等,都从某种前现代性的角度展示了对于故乡意向的审美想象与价值赋魅。像《笨花》中的“笨花”就意味深长,它融朴拙、沉稳与飞扬、轻盈于一体,表达了坚守的姿态,即对于乡土生活的眷恋以及传统文化道德的呵护。在新世纪文学视域中,中国形象的诗性意涵所指涉的主题是丰富复杂的,既关乎日常平凡与世俗烟火,又关乎康德意义上的“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法则”,与伟大和高贵的精神意义直接勾连。张炜的《你在高原》,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彭定安的《离原上草》,张海迪的《绝顶》和《天长地久》等,是这类书写的典型代表。孟繁华关于张海迪的《绝顶》所作的评论揭示了这类书写的意义目的,“这是一种和绝对精神相关的选择,也是一种彰显英雄对壮美渴望的选择。它在显示人类战胜自我和极端勇气的同时,也隐含了作者在想象中对挑战的向往和回答”^②。通过对高贵事物、应然世界、价值理想与浪漫人生等事关人的精神境界与意义世界的质询,新世纪文学

建构了一种远离世俗升腾云端的审美世界,以此暗喻中国形象诗性意涵的精神质地与价值高度。中国丰富的边地风情与悠久的历史文化一直塑造着中国独特的品格气质,关于神秘地域文化的书写与民族神话的叙事构成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诗性书写的又一一致思向度。“民歌、寓言和传说……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民族的信仰、情感、感觉和力量的结果。一个人信仰因为他不知道,他想象因为他看不见,他受到自己诚实单纯并且尚未发达的人性的激励。这实际上是历史学家、诗人、批评家、语言学家的一个大题目。”^③阿来的《空山》《格萨尔王》与《随风飘散》,苏童的《碧奴》,迟子建的《群山之巅》《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叶兆言的《后羿》,李锐和蒋韵的《人间》,红柯的《西去的骑手》与《大河》,刘亮程的《虚土》等等,他们或者深描地域文化的神秘世界,或者借助对民族历史神话的当代重述来唤醒崇高文化记忆,重构诗意秩序。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就其关于中国形象的诗性品格而言,它们都表达了中华民族的诗性智慧与对于自然万物、生命存在丰富性与深刻性的独特理解与体验。

四 中国形象诗性之维的表意机制

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美学规定,诗性品格之于中国形象书写而言不但意指其价值内涵方面,而且关涉这种形象书写的艺术形式与话语机制方面,对于新世纪文学的中国形象书写来说,它们表征为积淀着深刻而丰富的诗性意涵的“有意味的形式”。因应其内涵的这种特定性质,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书写在艺术形式与话语机制层面也呈现出具有中国古典美学趣味的诗性性质。

相较于价值意涵的表现力来说,艺术形式与话语机制更具有某种直观的感受力,它直接以感性的方式修饰了中国的人和事,彰显了中国形象的诗性气质。与日渐立足中国独特经验书写中国形象相一致,新世纪文学对于中国形象的书写形式与美学风格同样表征出了愈益浓重的中国古典诗化性质,经历西方形式主义与先锋叙事的文本与话语实验游戏之后,回返古典美学的历史深处已然成为新世纪文学以中国之形刻写中国之心的文化自觉。“看看近十几年来来的小说实践,我们

①雷达:《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②孟繁华:《2007: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天上人间》,《小说评论》2008年第1期。

③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也许有理由感到乐观,中国当代的作家们已经渐次学会了用更朴素的笔法来表现本土经验的写作路径:从20世纪90年代的《长恨歌》《丰乳肥臀》《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新世纪之后的《檀香刑》《人面桃花》《生死疲劳》《山河入梦》,甚至《秦腔》《受活》《刺猬歌》等,都具有明显的‘传统性’甚至‘地方性’色彩。如今不但已很少有人用‘洋腔洋调’的语言来写小说,而且在叙述方法和美感神韵方面,也呈现出对传统和本土经验的深层复归与认同。”^①贾平凹的《秦腔》从《红楼梦》与《金瓶梅》中吸取了细节刻画的传统笔法,创造了一种“密实流年”的文本景观,强化了细节的丰腴与鲜活,凸显了生活的真实感,还原并尊重生活的复杂性与日常性,深入发微了生活的微观肌理。在小说《带灯》中,一种注重阴柔与阳刚并置的叙事风格诠释了贾平凹的另一种古典美学趣味,他自我评价说,“几十年以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西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有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尖锐敲击。……我得有意地学学西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②。莫言一如既往地追求着小说创作的极致美学风格,民间叙事的熟谙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修辞性重构,叙述语言抑扬顿挫的音韵感,这一切都使得莫言的中国形象诗性书写别具一种审美的辨识度。王安忆极具古典诗意气质的作品《天香》宣示了她对于当代中国生活书写的古典折返,“天香园”中的人和事都氤氲着一种古典气息,字里行间情致温婉,清雅朴拙,隽永蕴藉。曾经致力于先锋叙事的苏童也以一种新的姿态表明,他对于中国古典艺术手法的理解与运用同样是卓越的,“意境中国”应该是他新世纪文学着力追求的一种美学理想。有论者指出:“读苏童的小说,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唐诗、宋词的意境,苏童的小说是以意境取胜的,苏童的小说,使用的是一种意象性语言,一种在唐诗、宋词、元曲中流传着的具有汉语特殊情韵的语言方式。”^③新世纪的代表作《碧奴》以现代寓言的形式重新诠

释了充满神话意味的古典传奇诗学,构筑了民族诗学的当代美学镜像。在新世纪语境中,格非以另一种“新锐”姿态重新定义了自己对于文学的理解,中国古典诗学从资源基础与价值逻辑方面成就了他新的创作形态与美学表达式,“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以浓郁的古典笔法写尽了中国人间的诗意盎然,一如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授予其获奖词所言,“这是一部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格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探索明清小说传统的修复和转化,细腻的叙事、典雅的语言、循环如春秋的内在结构,为现代中国经验的表现开拓了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与新的语言和艺术维度”。祖述这种致思向度并致力于深耕这种美学园囿的当代作家付秀莹更是表现出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付秀莹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学手法与美学风范,向来有着亲近之心与摹写之意。她的小说在进入和返向文学传统的路径上,吸收了梦境、留白、抒情、比兴等手法,在写景状物、虚实相生、生命循环上也保留着传统文学的诸多痕迹,连题目都有着趋向于古典的意境,如《惹啼痕》《定风波》《鹧鸪天》《绣停针》《秋风引》《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④。当被问及缘何形成这种具有浓郁中国古典韵味的美学风格时,付秀莹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这或许同我的人生态度有关,也可能是缘于我的审美理想。在审美上,我大约是偏于古典的一路。一晌凭阑人不见,鲛绡掩泪思量遍。如此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过尽征鸿,暮景烟深浅。说的是等待。那种怅惘哀伤,幽婉缠绵,跟《等待戈多》中的等待,那种荒谬、单调枯燥的等待,情味迥异,简直是两重天地。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懒,迟,是什么呢,是从容闲雅,有不尽的意味在里面。幽微、委婉、细致,情韵绵长。这是最中国的审美经验,也是最中国的日常生活。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这种悲慨旷达,隐忍包容,历千载不变。……这是中国文化喂养出来的中国风度”。以典型的中国话语言说独特的中国性情是付秀莹对于“中华文化基因”与“中华审美风范”深刻的体验与认同,激活古典美学意象,建构诗性中国的当代形态是付秀莹对于中国传统美学创造

①张清华:《关于文学性与中国经验的问题——从德国汉学教授顾彬的讲话总开去》,《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②贾平凹:《带灯·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页。

③葛红兵:《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④曹霞:《美学的自觉与“陌上中国”的建构——付秀莹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独特理解与自觉践诺,有论者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付秀莹所提供的恰恰是当今文学界最为缺乏的,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自觉体认,对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敏锐捕捉,以及对传统中国美学的新探索,也就是说,付秀莹讲述的是中国故事,表达的是中国情感,探求的是中国美学的新形式。她的小说不仅写出了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而且也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密码或‘集体无意识’,她能够把握住当代中国人丰富、复杂而微妙的经验与情感,并且以中国式的美学表达出来”^①。

作为诗性意涵的能指符号与感性负载,这些具有古典特点的艺术形式、话语方式以直观的方式实现了它的对象化存在,并使得中国形象的诗性之维落实到文本创作的实践层面与经验层面,最终获得一种在场感。就此而言,在新世纪文学语境中,从诗性之维书写中国形象,澄明中国社会生活内在固有的诗意基因与古典气质已不再是某种权宜之计,在其现实性上,它业已成了很多新世纪文学书写的本体论承诺。

结语

文学对于国家形象的书写除却致力于审美经

验与审美体验层面的感性状写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一个国家形象的灵魂书写,也就是说,最本真意义上的中国形象应该是对于中国精神的一种审美映照。在这样的意义上,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实际上就可以视为一种事关中国精神、中国态度、中国价值、中国立场等的美学修辞与文化隐喻。

在新世纪文学视域中,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既烛照了中国人独特的生命形态、存在方式、性格心理、情感意志与价值理想,又在此基础上表征了一种总体性的民族精神气质,“民族文化精神,是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价值体系,它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理性精神,诗性智慧,道德品格,思想风貌,进取求新的处世原则。它在不同的人群身上表现各异,但综合起来却是整体精神的体现,显示了民族精神的气度、面貌”^②。换言之,中国形象的诗性品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内在固有的结构性属性,对这种属性的书写深度探幽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质素、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其自我的独特理解,建构起了中国形象诗性之维的当代形态,接续了“诗性中国”的形象谱系与发展脉络。

Poetic Writing of Image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entury Literature

LI Sheng-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The Study Base of Integration of Hunan Dialect with Culture and Science & Technology,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Poetic writing of image of China is a new signifying of new century literature. In fact, this writing is a restatement of China which restructures the narration of Chinese experience and Chinese story. It is realized by returning and activating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spirit and aesthetic style form its basic resource dependence. Beautiful humanity, cultural nostalgia and native memory of aesthetic modernism, metaphysical spiritual realm and meaningful world, mystical reg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myth narrating constitute the aesthetic intention of poetic writing of image of China. In artistic form and discourse style, this writing shows a classical aesthetic taste which shows distinct and unique Chinese aesthetic style. For new century literature, this writing is a soul writing and spiritual illuminating of image of China from the deep culture.

Key words: new century literature; image of China; poetic writing; restatement of China; traditional aesthetics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李云雷:“中国故事”的独特魅力——付秀莹小说创作论,《百家评论》2014年第1期。

^②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